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8

華德迪斯奈



一號任新刊

566230

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566230

566230

華德·迪斯奈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8

主編：梁實秋

著者：鮑伯·湯瑪斯

譯者：殷禮明

出版：名人出版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1巷38號之10二樓

電話：七〇三三二二三、五

郵撥：一〇三三五二五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印刷：中興印刷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 印 翻 勿 請

有 所 權 版 ■





566230

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566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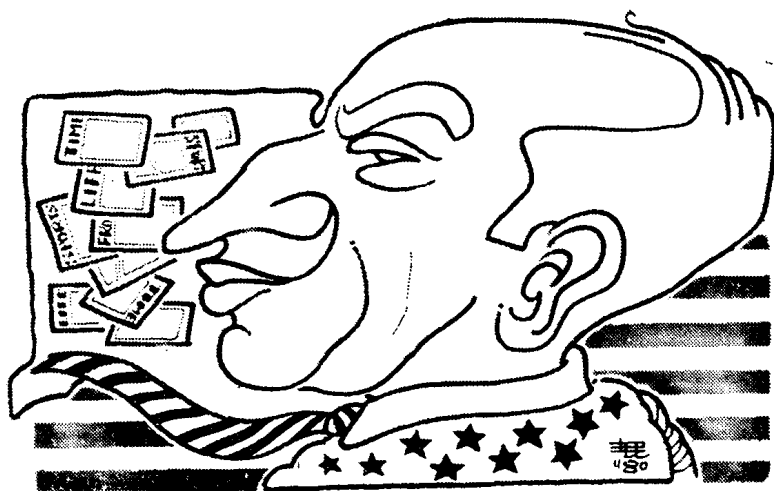
566230

●梁實秋主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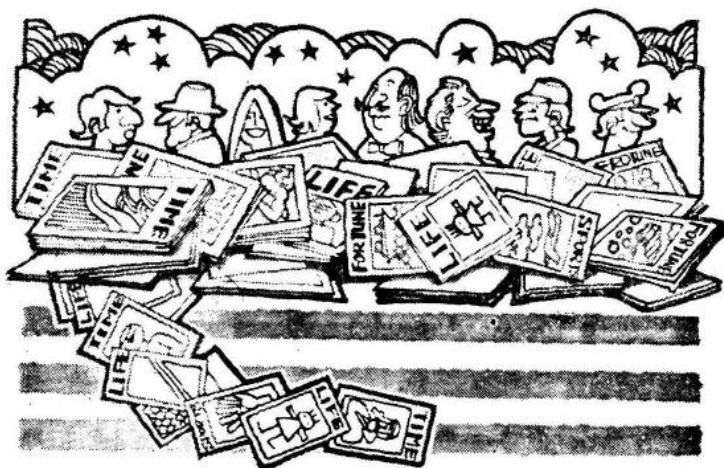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9

亨利·魯斯

時代王國的領導者.....	五
「中國佬」魯斯.....	三五
與海登同進耶魯.....	四三
發行『時代』週刊.....	四三
別具一格的『時代』週刊.....	五
痛失好伙伴.....	七
步上嚴正優雅的坦途.....	七
『財富』.....	三八
向廣播與電影界擴展.....	八
巧遇美人兒.....	九
飛躍的『生活』.....	一〇三
爲正義而戰.....	一二四



女參議員.....	二〇
安之死.....	二三
嚴厲而充滿愛心的家長.....	二七
信仰與偏見.....	二七
『時代』的一週.....	二七
無法抗拒的『時代』.....	二〇
性情中人.....	一三
備忘錄.....	一六
父親的影響.....	一八
晉謁 蔣總統.....	一八
女外交官.....	一九
相敬如賓.....	二四
『體育畫報』.....	二九
永遠做個清教徒.....	二五
後記.....	三五
年譜.....	三九



4-1037/54

時代王國的領導者

有次，一位電視記者問亨利·羅賓遜·魯斯，難道他不覺得擁有太大的權勢嗎？

「這個問題似乎非常抽象呢！」魯斯說。

「那裡，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怎樣來度量權勢呢？你又不能把它拿來稱一稱看有多重。」

「可是你的確是大有權勢的，不是嗎？」

「嗯，我可不願說這是權勢？」

「也許把它說成是影響力和高層面的責任感還差不多。我想，把權勢和公家機關相聯結在一起，比較更能顯出權勢的意義。」

「不錯，」記者說，「不過你的那些雜誌可的確是影響著公家機關的。」

「嗯，如果你一定要這麼說，就算是這樣吧！」魯斯終於讓步了。

魯斯這番話實在很謙虛。如果衡量權勢的方法，是看一個人能影響多少心靈，那麼實在很少有人能以在野之身，像魯斯這位時代公司的創建人、公司主要股權擁有人兼總編輯那樣，支配着這樣大的權勢。在曼哈坦一座價值七千萬美元的大樓裏，百分之四十五為時代公司所有，在第三

十四樓，魯斯有一間雅靜的辦公室，室內最搶眼的是一幅整座牆壁大小的世界地圖，魯斯就在這兒，控制著影響千萬人心的事業。『時代』雜誌是魯斯事業的基石，它的發行數量達到兩百九十九萬份。其餘的期刊還包括有『生活』（七百萬份）、『體育畫報』（一百萬零五千份）、『財富』（四十萬份）、『建築論壇』（六萬兩千份），以及『屋與家』（十四萬份）。其中，『時代』與『生活』在大約兩百個國家中發行的國際版，使得總發行數量達到一千三百萬份。（以上皆為一九六四年的統計資料。）

前芝加哥大學校長羅勃特·哈金斯，在把魯斯對美國人的性格的影響與支大對美國人的性格的影響相互比較之後，下結論說：「魯斯先生的影響力是支大的二至二十五倍……我甚至可以说，魯斯先生和他的那些雜誌對美國人的性格所產生的影響，要比整個的教育系統加起來還要大。」

身為一個資本家，魯斯還有另外一個特徵，那就是，與他同一時代的美國人當中，只有少數幾人能像他一樣靠著筆耕建立起這樣龐大的個人財富。時代公司一千八百萬股份裡，魯斯即擁有其中的百分之十六點六一，相當於大約四千三百萬美元，每年為他帶來超過一百二十五萬元的股息收入。

除了期刊之外，時代公司尚擁有以下的產業：一個郵購書籍的部門，這個部門，於一九六四年，在國內售出了八百萬本書，在國外售出了一百萬本；一個教科書的附屬部門（售出了六百萬本）；一個叫做「時代讀書計畫」的讀書俱樂部，擁有將近十萬人的訂戶；五家廣播電臺，六家電視臺，收聽、收看的人家達兩百五十萬戶；好幾家造紙廠、林地、油田、與各種各類的不動產

。一九六四年，在全美五百家最大的實業公司資產指南中，時代公司名列第一百五十七位，領先於像喬治亞·太平洋、菲爾波斯·道奇，和開瑟這些鉅子的事業。一九六四那一年，也是時代公司自開創以來獲利最豐的一年，時代公司共獲純利一千四百二十萬四千美元。

但是，促使魯斯致力於改進自己國人的流品的，並不是他的財富，也不是他個人的榮耀，而是他那種像傳教士一般的熱忱。就算不是人人所見與他略同吧，他却確實是把自己的影響力用在一個真誠的信念上，他以爲他知道，什麼對自己的國人是好的。魯斯是個堅定的共和黨員，同時也是個虔誠的長老會教友，他是牧師的兒子，是個熱情、坦白、實事求是、無甚幽默感，有時還會惑於自我的人，他以爲美國應有其崇高的理想和命運，爲了這個理想和命運，他可以說是殫精竭智，不遺餘力。有一次，他對時代公司的主管們談起他在中國度過的童年，他說：「最初，我也許對美國抱有過於浪漫，過於理想化、完美化的想法，這倒不僅是因爲美國從遠處看起來要比實際上的好，而且也與美國遍地黃金無關；事實上，從小到大，人們就教導我，美國要是有甚麼毛病，那就是太多的人太有錢了，而富人們總是比其他的人們更容易犯罪。我的先人們在美國過了三百年，他們沒有金錢上的顧慮，雖然有時候還是很傑出的，但却從來沒有富有過。我對美國所以會持有一種理想、完美的看法，實在是由於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美國人，個個都是好人的緣故。」

他接著說：「那時，我以爲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善良的基督徒（少數必然的壞蛋，像劫掠行人的匪徒和坦馬尼協會的政客們除外），再加上把美國看成是個了不起的國家，人人都享有各種的機會、自由與公平，難免叫我產生一種理想式的，甚至於是太切合實際的浪漫式的想法——」

一種錯誤的浪漫式的想法。這種觀點下，我認爲在根本上，人們並無性惡的弱點；人們很可以同時又善良、又富足，就算不是大富翁吧，也是有教養、充滿活力、富有進取心，且既重實際又兼顧精神地過著快樂的生活。這裏，我並不是說美國的憧憬已經幻滅了，事實上，我的憧憬從未消滅過，我從來不曾對美國失去信心，而美國也未曾讓我失去信心，只是，我從成年開始，就對美國不太滿意。美國並不是如我所認知、所相信的那麼好的一個泱泱大國。」（坦馬尼協會是民主黨在紐約的一個有力的政治組織，創始於一七八九年。）

魯斯很少錯過星期日的教會禮拜，也不會忘記在睡前祈禱，他認爲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頗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使他憂心忡忡。他尊敬任何一個態度嚴謹的傳統宗教的教徒，不論他是長老會教友、羅馬天主教徒、東方猶太教徒、悲天憫人的單一神派教徒、末世天主教徒，還是猶太改革教徒。他在寫作和演說當中，常常提到上帝、聖經，與對美國的見解。他把美國的問題解釋爲兩股主流匯合的產物——十八世紀法國個人自由主義和天主教融合的結果。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年，魯斯在聯合神學院發表演說時指出，儘管「美國不完全是個基督教國家」，而美國所面臨的待解決、待證明的，却是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問題。他的觀念與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看法大不相同；他堅持「美國人所以能够成功地、緊密地團結合作在一起，完全是由於美國的立憲精神是以上帝爲依憑所致」。他接著說他有一種感覺，覺得在歷史上，除了古代的以色列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般，很顯然的是上帝爲了祂的永恆目標，而特別授命的一個國度。（在其他的場合裏，他且宣稱共和黨正是代理執行上帝的永恆目標。）

那次演說之後不久，在南美以美教會大學的新的法學中心落成典禮上，魯斯又呼籲律師們：

「揚棄奧利佛·溫德爾·賀摩斯」，因為賀摩斯主張人的意義與狍狍或是一粒砂的意義不應有所不同，而事實上，一國之內大多數人的票決就可以戰勝所有的一切。這位法學大家的哲學是「現實主義、軍國政策、相對主義、未知主義，還有一項——挑個最引人、最文明的字眼來說就是「犬儒主義」。對於賀氏這套哲學，魯斯深表驚駭，並公開加以譴責。（未知論者相信除了物質外，其他的一切，即使是上帝，也都是不可知的。）

魯斯本身就是個戰場，相互矛盾的各種論點，在這兒鏖戰不休——他個人的倫理觀對抗著羣體的倫理觀，他的富有對抗著他對鄰人的關懷，他在道德與宗教上的嚴謹對抗著他的自尊與自重，他那喀爾文教派的基督教精神對抗著他事業成功的事實。談到他從事出版事業的早期奮鬥的情形，魯斯無限難過地說：「那個歹運女神就坐在外邊的辦公室裏等着我。」

就算是一國各部門的首長吧，也少有人像他那樣把自己和自己的職責看得那麼嚴肅而重要的。他行事的方式，就好像時代公司是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延伸機構，或者美國國務院是時代公司的延伸機構似的。一九四〇年，他派遣第一位通訊員前往柏林，他的臨別贈言是：「你到了那裏之後，務必記得，你是僅次於美國大使的人。」一位董事會的董事對這個觀念支持得更為徹底，他以爲：「在總統和國會之後，時代公司就是美國最重要的機構。」

當南越的吳廷琰政府面臨日益嚴重的越共威脅之時，時代公司與國務院都贊成對越共加以痛剿，魯斯偶然遇見了從前曾爲他工作，而當時爲助理國務卿的舊日僚屬時，不禁說：「我看，我們兩個在越南都碰上了麻煩呢！」

「時代」週刊雖然位處國內，却儼然像個大國般地處理有關國內外事務的報導，因此，它很

少把通訊員從現場寄回的新聞報導直接付印。這些報導，必須先在『時代』的紐約總部經過一番考量，看看是否與魯斯的政策、決定一致。他們所召開的巨頭會議和所舉行的僚屬午間會餐，真是像煞了由美國總統所召集的國家安全會議。編輯和執行編輯們，常會如國會議員那樣，匆匆地踏上旅途，以尋訪事實的真相。在這些高階層指揮人物當中，固然不乏睿智而有真知卓見的人士；可也難免有些阿斗之流，他們的干預往往只會徒增困擾。一九六三年，『時代』雜誌香港通訊員史坦利·卡諾返國探視，他的頂頭上司就不斷地問他：「誰能接替吳廷琰的政權？」他們似乎覺得，除非能夠提出一個繼承者，否則就不該對這位處境已經十分艱難的統治者橫加批評。『時代』雜誌應該只限於報導這場戰事才對，而不是去訂定國家政策，卡諾說，這個上司可唬不住他。

一九五三年，魯斯訪問印尼回來，為一個編輯做了一份備忘錄，在裏面他寫道：「對於這個領土廣大的新國，坦白地說，我以為我們的政策應該如下：不要一定強迫他們怎麼樣，不論是錢財方面還是思想方面。印尼人對白人十分敏感、多疑，却又狂妄自大，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個性，所以，我們的態度應當是：對他們無所要求，也無所需求；他們若是想要我們甚麼東西，讓他們自己開口要。」

當然，我們和他們之間，應該圓熟地維持著外交的和其他的關係，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有禮而又謹慎自制。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顯示我們對印尼人民和文化深感興趣、深感關懷，但是，我們和印尼政府及其各個政黨之間，却只能有公事來往的關係。

有些人也許會問：難道我們非得深切地關懷印尼不可嗎？難道我們不必像在別處那樣，在印

尼繼續我們的反共之戰嗎？難道我們不應繼續努力，以減緩印尼境內的不滿情緒，避免使共產主義有可乘之機嗎？我的答覆是，我們必需守住馬尼拉——西貢——新加坡這條陣線，要堅強有力地嚴守着，以對抗共產主義。果能如此，我們或可對印尼國內的問題，冒險地暫時聽其自然發展。」

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份備忘錄裏，他寫道：「我希望你能對我們的南美洲的政策和南美洲的人們做一番徹底而有意義的研究。這裏的『我們』，我指的是美國政府和時代公司。」

一九六一年，魯斯把一個「重要的目標」交付時代公司，那就是擊敗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在一次執行主管的餐會上，他問道：「這算不算是一種個人的宣戰呢？要算是的話，它會不會不合法或者根本是瘋狂的行爲？也許是這樣，然而個人的宣戰，却有好些重要的先例可援呢！」他舉出遠在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之前，法蘭西斯·德瑞克爵士就曾與西班牙國王王進行自己的海戰，並且說：「當然，我們時代公司現在無法像法蘭西斯·德瑞克那樣進行真正的戰事。（有些聽者還聽出了他語調裏透著遺憾。）德瑞克還有幾艘戰艦可資運用，不過由於伊麗莎白女王大幅度的削減，他所擁有的少數戰艦也只能算作是他私人的企業罷了。我們沒有船、沒有鎗、沒有砲，再說，這也不是一個海盜劫掠的時代。我們的時代不像十六世紀，我們的時代是個新聞事業的時代——至少在這新聞業的戰場上，我們還能盡點棉薄之力。個人的戰爭嗎？不對，在這個有高度組織的時代裏，這個名詞已經過時了，但是組織裏的個人也不能坐著等政府去辦每件事情呀！我們國內的每個人和每個團體組織，爲了自由，都應該對共產主義迎頭痛擊，而且就在現在。」

在這個進步的時代裏，魯斯却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早期渡海殖民的教徒，顯露著一種淡遠的



尊嚴。魯斯高瘦，下頷透著堅毅，他的脣薄，粗濃的眉毛之下，安著一雙不大、淺藍色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專注而情感內斂。他的手長而形狀美好，手背長著汗毛。他的頭頂已經光禿，原先長著紅髮地方的邊緣上，只賸下幾撮稀疏的白髮。平常他臉上的表情總是堅定而叫人莫測高深；雖然患有重聽，却一直到逝世前幾年才肯配戴助聽器。「你應該下定決心。使用助聽器，」一個和他一樣的重聽患者告訴他，「不過却要長時期的耐心才能習慣。」耐心正是魯斯所欠缺的，他沒有聽從這個忠告，他說：「如果我周圍有十個人在說話，我能聽到、聽懂其中七個人所說的就够了，另外三個人可能根本不值一聽。」他這麼想可是錯了。在僚屬會議中，他常常把乙編輯所說的一些他不接受的論點，當成是甲編輯所說的，而對甲編輯大加責備。一次，一個時代公司的執行編輯反對另一個執行編輯的建議，說：「這個主意真是瘋狂。」魯斯只聽到最後一個字，隨口就說：「我並不瘋。」

他忙碌的思想常遠遠地跑在他的口舌之前，使得